

陈青生 陈永志 著

创造社记程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JICHOENG

DZ74/20
创造社记程

陈青生 陈永志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198668

责任编辑 陈如江
封面设计 邹越非

创造社记程

陈育生 陈永志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崇明红卫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字数 141,000

1989 年 9 月第 1 版 199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80515—321—3/I·33 定价 2.60 元

目 录

前期篇

第一章 创造社的成立和前期概况	1
第一节 历史浪潮的推动	1
第二节 从酝酿到成立	6
第三节 有声有色的活动	13
第二章 强烈的民主主义革命倾向	19
第一节 “要以生命的炸弹来打破这毒龙的魔宫”	19
第二节 明显的社会主义因素	24
第三章 采择百家、独树一帜的文艺思想	30
第一节 来源、构成和基本倾向	30
第二节 “文学是自我的表现”	35
第三节 “超越的”兼“建设的”文艺批评主张	41
第四节 应该消除的历史误解	46
第四章 新文学浪漫主义创作的丰硕成果	51
第一节 多种创作方法并存 浪漫主义为主导	51
第二节 浪漫主义作家群	55
第三节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	62

中期篇

第一章 中期概况	68
第一节 活动的恢复和开展	68
第二节 建立出版部和发表社章	77

第二章 日趋增强的社会主义倾向·····	83
第一节 初步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要求·····	83
第二节 积极的革命实践·····	87
第三节 革命政党的关心和引导·····	91
第三章 转换过程中的文艺思想·····	95
第一节 新旧文艺思想的交替·····	95
第二节 对诗歌、小说理论的深入研讨·····	99
第三节 初步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帜·····	107
第四章 色彩纷呈的创作·····	113
第一节 创作方法多元化及其发展趋势·····	113
第二节 浪漫主义的退潮·····	116
第三节 现实主义的增强·····	121
第四节 革命现实主义的初兴·····	125
第五节 一度盛开的象征主义之花·····	128

后期篇

第一章 后期概况·····	133
第一节 “明朗的思想战的基地”·····	133
第二节 新的阵容·····	138
第三节 汇入左翼文化运动洪流·····	144
第二章 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学说·····	150
第一节 宣传工作的特点·····	150
第二节 “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	154
第三章 积极阐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	159
第一节 致力于理论斗争·····	159
第二节 基本的理论主张·····	166
第三节 意义和局限·····	174
第四章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	178

第一节	走上革命现实主义之路.....	178
第二节	革命鼓动和左倾杂质.....	182
第三节	艺术追求的得失.....	186
后 记		192

前 期 篇

第一章 创造社的成立和前期概况

第一节 历史浪潮的推动

创造社是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留日学生发起组织的我国早期新文学社团。它的出现，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由大一统的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然而，革命果实落入封建军阀之手，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外国侵略加紧，军阀战争加剧，反动统治阶级极力鼓吹“尊孔”、“读经”，中国仍在黑暗之中。民族资产阶级已无力再领导人民前进，这刺激了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认识到在中国仍然需要进行彻底的反封建斗争，于是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这场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办《青年杂志》为开端。它包含着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思想启蒙运动，中心内容是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号召打倒孔家店，提倡科学与民主；另一是文学革命运动，它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这两个组成部分是相互沟通，彼此

促进的：思想启蒙是文学革命的思想支柱，文学革命则贯彻和宣传思想启蒙。

新文化运动初期，进步的知识分子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武器，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情况不同了。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一部分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转变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更多的知识分子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同程度的吸引。他们的变化，使新文化运动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局限，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并开始关注实际的政治斗争。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同群众政治斗争相结合。与思想启蒙运动出现新特点同时，文学革命运动也由理论鼓吹逐渐显示出实绩。一九一八年一月出版的《新青年》（其前身即《青年杂志》）四卷一期，开始全部采用白话，同时刊载了胡适等人的白话新诗。随后，该刊又相继发表了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和胡适的白话剧本《终身大事》。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一方面，新思潮日益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逐渐成为主流。另一方面，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更高扬起反抗的热情，其中深受文学革命影响的便以文学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从而壮大了新文学的队伍，新文学社团也就应运而生。首先成立的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继之而起。创造社的成立，除了和文学研究会一样受到国内历史潮流的推动以外，还有它特殊的原因。

郭沫若等人大多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五四运动之前这段时间里离国赴日的。他们的生活经历并不相同，赴日求学的动机也有差异。然而，某些相同的情况促使他们共同走上文学道路。这就是，他们都接受过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对西方文学

也有初步接触，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和相当的修养；他们都具有关心祖国命运并乐于报效祖国的爱国热情。由于他们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故而留日期间大多选学的是自然科学专业，选修文学的很少。在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浪潮和中国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感到科学救不了国，搞文学更有意义”^①，于是先后离弃了选修的专业，积极投身于新文学运动之中。

中华民族在五四运动中显示出来的伟大革命精神和力量，极大激发了他们文学创作的激情。郭沫若在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〇年相交的几个月时间里，几乎每天沉浸在灵感来袭的创作心境中，他的新诗，从一九一九年九月起便陆续在《时事新报·学灯》等报刊上发表。张资平在一九一九年秋冬开始写作长篇小说《他的生涯》（发表时易名为《冲积期化石》），并于一九二〇年在《学艺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约檀河之水》。成仿吾也在一九二〇年初开始写作新诗和短篇小说，部分作品曾在国内发表。就在这一年中，郁达夫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生涯；田汉确立了要做艺术家的志向，开始写作和发表新诗及剧本。其他一些留日的早期创造社成员如郑伯奇、穆木天、陶晶孙等，也都大致在这时开始了新文学的尝试。其中，郭沫若的新诗震动了新文坛，他本人被誉为“当时诗坛的霹雳手”^②。这些，反映了这批留日学生新文学创作的起步乃至成就。

国内的新文学运动，在经历了五四运动之后，也出现了新的情况。^③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由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的文学研究会正式宣告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它的成

① 成仿吾：《怀念郭沫若》，1982年11月24日《文汇报》。

② 茅盾：《化悲痛为力量》，《悼郭老》第2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立，标志着文学革命不再从属于新文化运动，而开始独立出来。文学研究会反对将文学作为游戏与消闲的观念，高举起文学为人生的旗帜，同时大力提倡写实主义，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当时的文学创作仍有着不尽人意的状况：“作者固然不多，发表的机关也寥寥可数”^①，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思想性和艺术性不高，甚至于粗制滥造。作者中还有利用新文学猎取名利的投机者。这又反映出新文学运动需要坚持方向，克服弊端，继续前进的要求。

决心投身新文学运动、并在创作上获得相当成就、或已开始创作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当然会对上述状况作出反应。对于文学研究会，他们认为这位“兄弟”在新文学运动中显得不很得力，对于它所提倡的写实主义也不以为然。至于新文学创作水平不高、粗制滥造等现象，他们更以为是新文学运动的一种危机。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急挽狂澜”，使新文学运动重新振兴并蓬勃发展。成仿吾在一九二〇年致郭沫若的一封信中，曾心情急切地说道：“新文学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②由于相近的思想和共同的志趣，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郁达夫等，早些年已经逐步建立起以郭沫若为中心的联系网，酝酿过出版同人刊物；这时，出于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心，出于国内新文学运动现状的种种不满和忧虑，他们更增强了联络同志、出版同

①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② 转引自郭沫若：《创造十年》，《沫若文集·七》第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人文艺刊物的决心，并且在实际上加快了组建社团的步伐。

这些留日的中国青年，对国内新文学的现状不满意，为什么非另立旗帜、另组社团不可呢？建设新文学的使命感当然是原因之一，但加入文学研究会不也可以满足这个使命感吗？何况郑振铎还向郭沫若发出过邀请。很显然，这里还有别的原因。郑伯奇说：

十九世纪末叶，欧洲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文学走上了反现实主义的道路，连自然主义也吃不开了，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新浪漫主义等新流派像雨后春笋一般簇生出来。日本由于大战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结果，急骤地伍于帝国主义的行列，日本文学界也得相应的反映，小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突然衰颓下去，西欧所发生的各种新流派代之而兴。创造社的主要成员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这种学习环境的影响。所以，惠特曼、王尔德、有岛武郎等人的名字曾经屡屡出现在创造社作家的笔下。由此可见，并不是创造社硬要标新立异，打出浪漫主义的旗子，故意和国内其他文学团体闹对立，而是这些作家的生活、学习环境造成的。①

这段话指明：创造社之所以另组社团、另立旗帜，是他们的“生活、学习环境造成的”，也即他们在日本大正时期的文学背景中，广泛汲取了古典的和现代的世界文学潮流的营养。他们笔下经常出现的作家的名字，当然不止惠特曼、王尔德、有岛武郎，还有歌德、席勒、海涅、施笃姆、凯撒、托勒、拜伦、

① 郑伯奇，《忆创造社》，《忆创造社及其他》第4—5页，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版。

雪莱、济慈、罗塞蒂、波特莱尔、魏尔伦、梅特林克、列夫·托尔斯泰、泰戈尔等。这众多的名字，表现出他们对于积极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主要是表现主义与象征主义）的醉心。正是在这个与文学研究会不同的社会和文学背景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学倾向。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为建设新文学而努力时，不乐意加入文学研究会，却情愿标举新的旗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创造社是我国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运动与日本大正时期盛行着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世界文学潮流这两者结合而产生的宁馨儿。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把世界文学的营养融汇入我国文学革命运动的要求之中。

第二节 从酝酿到成立

在创造社成立以前，郭沫若、陶晶孙、何畏、郁达夫、徐祖正、刘恺元曾共同出版过《Green》。这是一份由打字机打印，刊载同人文学作品的刊物，编辑是何畏。何畏在《Green》第一期《编辑的话》中说：“我们从此努力吧，这事想对我是极快活的事。”^①这恐怕可以看成是所有成员的共同心情。该刊只出了两期，就因打字者感到困难而停止。但同人的聚集，杂志的发刊，无疑是以以后成立创造社、创办同人刊物的最初尝试。“Green”有绿色的、新鲜的、青春的、未熟的、无经验的等含义，反映了该刊成员对于自己文学活动的热情、希望、新鲜感与尝试心理。郭沫若等人后来以“创造”为文学社团和杂志的名称，可以说是“Green”的必然发展，是他们经历过初步尝试，进一步成熟起来，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信的一种表示。

① 转引自陶晶孙：《音乐会小曲·书后》，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版。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把创造社当成“Green”在组织上的直接继续。创造社有它自己的酝酿、成立过程。

一九一八年夏天，郭沫若同张资平、成仿吾商谈过邀集志同道合者筹办新文学刊物的想法，这可以视为创造社的最初“受胎”。五四运动以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的文学交往更加频繁，并且进一步联络他人。一九一九年间，通过张资平的介绍，郁达夫认识了成仿吾，随后又与郭沫若建立了联系。这时，同在东京的成、郁、张三人便为筹办同人杂志，经常聚会商讨，且随时向在福岡的郭沫若通报情况。一九二〇年初，在宗白华的介绍下，郭沫若与当时在京都的田汉结交。此后，经过田汉的介绍，郑伯奇和穆木天也相继成为郭沫若的朋友。不久，他们又通过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等建立了联系……。这样，到一九二一年初，他们以及当时在日本的另外几位爱好文艺的中国留学生，便集结起来了。由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卓越成就，在这批从事新文学运动的留学生中，他便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郭沫若和这些留学生在新文学创作上的初步成果和他们的汇聚，为创造社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九二一年初，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决意在国内创办同人刊物。二月间，田汉为此通过国内友人，与上海的中华、亚东等几家书局联系，但没有结果。这时，成仿吾接到一位友人从上海的来信，说上海泰东图书局有意聘请他为编辑所的文学部主任。郭沫若得悉这一消息后，期望藉此展开他们共同的文学活动，于是两人当即辍学，相伴回到上海。可到后方知所谓聘请一事，全属子虚。成仿吾返回故乡长沙。郭沫若则暂留泰东图书局，于帮助编务同时，为自己和朋友们拟议中的纯文艺杂志寻找出版处。

泰东书局创办于一九一四年。股东们多与政学系有关系，讨袁胜利之后，股东都到北京做官去了，书局便由经理赵南公主持。泰东是个小书局，资金算不上雄厚，虽然一度靠印行“礼拜六派”的小说赚了钱，但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这类小说的销路日趋衰落，它的经济状况也不免趋于拮据。看到社会上新文学的时兴和广大读者对新文学的欢迎，赵南公从维持书局的角度考虑，也产生了出版新文学书刊以谋取实利的打算，何况又有郭沫若在文坛上的名气以资招徕，便决定由泰东出版郭沫若等人的同人刊物。这个决定，客观上使泰东图书局成了创造社的产婆。

郭沫若在得到赵南公的承诺之后，便为此折返日本，来往于东京、京都等地，联络同人。一九二一年六月，郭沫若等人在日本东京郁达夫的寓所聚会，出席会议的有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何畏、徐祖正、田汉、杨正宇等。会上大家一致赞同郭沫若以“创造”作为同人刊物的刊名和文学社团的社名的提议，并同意同人刊物“暂出季刊”，待“将来能力充足时再用别的形式”。^①会上还讨论了第一期《创造》季刊的大体内容和编辑“创造社丛书”的计划，初步确定了各人承担的稿件。这次会议，标志着创造社的正式成立。郭沫若等人的文学活动，自此由个人活动转向团体活动。

一九二一年八月，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辑，由泰东书局出版发行。九月廿九日，“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在上海《时事新报》第一版上赫然刊出。“预告”末尾附列了“创造社同人”的名单：田汉、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创造社正式登上了中国文坛。

● 郭沫若：《创造十年》，《沫若文集·七》第108页。

创造社在酝酿时和成立初，都不想办成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第二期的《编辑余谈》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

他还同时告诉那些希望加入创造社的“朋友”：只要是赞同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也不要甚么介绍，也不经甚么评议”，“优秀的作品”便是“超飞过时空之限的黄金翅儿”，便可以同创造社“一块儿翱翔”。这样的想法，反映了他们个性解放和民主自由的思想，反映了他们对优秀作品的迫切要求，也反映了他们对迅速扩大新文学队伍的热切渴望。尽管这些都体现出他们建设新文学的使命感，但没有固定的组织，社员出入随意，思想更无约束，创造社自然也只能是一个组合松散的社团。

这种松散的组合，甚至使创造社从一开始就没有严格的“社员”身份。最初公布的“创造社同人”名单中，就没有包括陶晶孙、何畏、张凤举、徐祖正等创造社最早的基本成员。而没有明确的“社员”身份，又使一些成员的责任感薄弱，抱着有稿就交、乐意就交，反之则不交的态度，致使前期创造社的刊物，时而稿挤，时而稿少，有时还出现稿荒。

虽是组合松散，但创造社并非乌合之众，它不是没有核心。这个核心就是郭沫若、成仿吾和郁达夫三人。其中，郭沫若作用更突出一些。郑伯奇对此曾给予明确肯定。他说：

创造社毕竟是以沫若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本来，像创造社这样的团体，组织

不拘形式，社员又无须拉拢，似乎应该很便当了，然而实际上却大不然。这种自由结合的组织，成立以前需要有人热心地去打基础，成立以后更需要有人耐心地去支持和推动。若没有一个中心，组织不易成立，成立后更难于维持。沫若对于创造社的功绩，不止是起草社章，号召同志，交涉杂志丛书的出版而已；充实刊物，处理人事，以至对于外来攻势的防御，这一切都有赖于沫若的苦心和努力。^①

当然，这并不排斥成仿吾和郁达夫也是前期创造社的中心人物。一方面，就郭沫若和成仿吾、郁达夫三人的关系而言，不存在谁是“领袖”，谁是“帮手”，彼此都是朋友，平等相处；另一方面，成、郁两人也确实对创造社发挥了郭沫若所无法替代、其他成员所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他们在创造社酝酿期的作用前面已经说过。创造社成立后，郁达夫为数甚多的小说是前期创造社刊物的主要支柱之一，成仿吾则以犀利的批评成为创造社理论批评家的代表，此外，他们都以极大的精力操持了创造社繁杂的事务。难怪郭沫若把他自己和成仿吾、郁达夫并称为支撑前期创造社的“扛鼎三足”。

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三人成为前期创造社的核心，是在创造社的实际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他们对创造社活动的积极努力和特殊贡献，为全体成员一致肯定和推崇。这样，他们的政治立场、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创造社的倾向；他们对于开展创造社活动的态度和他们的聚合离散，也构成创造社发展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内部因素。

^① 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参差集》第5—6页，西安大陆图书杂志出版公司1946年6月版。

同组合松散却有核心一样，前期创造社成员思想和创作倾向，虽“并不相同”，“也并不强求相同”，但仍有着明显的共同点。

第一，他们都有建设新文学的使命感。如上所说，他们从事文学工作的这个基本态度，在创造社的酝酿时期已经清楚的表现出来了。在创造社成立以后的活动中，更是多方面地、强烈地体现着。他们认为，《新青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旧文学，文学研究会继续这一任务的同时，开始转向建设新文学，批判旧文学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旧文学已无须他们再来攻击，建设新文学才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切实建设了新文学，才能真正推翻旧文学。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民国初年的一辈人，已经趋于落伍，自己作为“民国十年”的后起者，才能实现建设新文学的任务。在这里，他们正确看到文学革命从批判旧文学向建设新文学的转变，并据以确定自己的使命，可对批判旧文学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对建设新文学的路径理解不够。他们在确定自己的使命之后，的确以忘我的努力，在创作、批评、翻译方面都取得优异的成绩，对建设新文学作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存在着忽视对旧文学营垒的战斗，特别是没能团结新文学阵营内部的突出缺点。

创造社还把建设新文学同建设整个新文化联系在一起。张资平在一封致郭沫若的信中说到：“我们何不在《创造》后面开辟一栏批评一切出版物？最好先从教科书入手（不必限于文艺的东西始批评）。或就在周刊内一一批评亦可。要救济中国的青年，要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我想非从此革命一番不可。”^①创造社在丛书中容纳了几本哲学著作，并拟议出版科学丛书、新智丛书，

^① 张资平，《通信一则》，《创造日汇刊》第70页。